

J. F. Herbert 著
尚仲衣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普通教育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38940.1)

漢譯世界名著 普通教育學 一冊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英譯者

Henry M. and Emmie Felkin

重譯者

尙仲衣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楊蔭深)

譯者序言

十八世紀的德意志，在歌德（Goethe）與席勒（Schiller）領導之下，對於希臘的文物與生活有一種新起的熱誠研究運動。在教育方面受此運動之影響最深的，即爲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一七七六——一八四一）。他即以這種新人文主義爲經，以當時的心理觀念爲緯，交織成一種教育的學說。

赫爾巴特卒於一八四一年。但其教育學說直至一八六五年以後，由於其思想之承繼者崔勒（Tuiskon Ziller——一八一七——一八八三）之著述與宣傳，並由於其方法在耶納大學（University of Jena）附屬學校之實際試用，始得以風行於德意志。

卽至一八八五年而後，有若干美國學生如德甘謨（Charles De Garmo）、墨克摩利（Charles and Frank McMurry）兄弟先後留學於耶納，深受赫爾巴特學說之影響，他們歸國後，即介紹

赫爾巴特之學說於美國，以爲師範學校師資訓練之基礎。赫爾巴特運動由於他們的努力，於一八九〇年左右，在美國教育界中曾爲一時之風尚。後來並組織一種全國赫爾巴特學會以研究並推廣赫爾巴特之學說。此學會即現時美國教育研究之中心的學會，全國教育科學研究學會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之前身。

在教育學的範圍中，赫爾巴特的學說雖然已成過去，卻無疑的在教育思想史上留下很深的遺跡。

赫爾巴特在教育方面有許多著作，但其中之主要的則有兩種：一八〇六年出版的普通教育學 (Allgemeine Pädagogik) 及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教育學講義綱要 (Umriss Pädagogischer Vorlesungen)。

普通教育學的英譯本爲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係費爾金夫婦 (Henry M. and Emmie Felkin) 一八九二年之所遙譯。在其序言中，關於赫爾巴特此書的文學，曾有如下的觀念：

「赫爾巴特文學的風格，帶有古典的形式，所以給予譯者種種的困難。行文之間具有其自身之特有的格調，將思想儘量凝集，處處使讀者不得不給以精密的注意……在遼譯時固然亦可用一種比較更爲流暢的英文文字，但所得之結果，恐將非赫爾巴特之原意，而僅爲其概要之敘述而已。所以吾人決定在此譯本中，採用一種較爲艱澀而較爲信實的譯文」。

目前這一中文譯本，實可謂爲一種重譯本，因爲在遼譯時主要的是根據於費爾金的英譯本（一九〇二版本）而佐之以赫爾巴特之原文（一八五一年哈滕斯坦——Hartenstein——版本）。

在遼譯第三編時，鄧君治明，曾給以極大的幫助。譯文脫稿時鄧君已因病肺逝世。故於付梓之際，特附數言，以留紀念。

尙仲衣 一九三五，九月二十日。

英譯者費爾金夫婦 (Henry M. and Emmie Felkin) 序言

1 赫爾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的生平及其教育著作

現時最偉大的藝術批評家之一曾說，藝術家之真實能力，在描寫一個男性或女性，以及其中所蘊藏的靈魂時，方被試練到極點，在其他的方面決無如此深刻的試練，亦無如此充分表現的機會。無論這藝術家的工具是文字或是線條彩色而這種意見都是同樣正確；誠然，這藝術家如果是一個作家而非畫家，這種意見或者更為合適，因為以比較簡單的材料，表現出任何印象，均要求運用者技術之較大的穩定性與其內在察覺之較深刻的精確性。在下面簡短的傳記中，作者並不希望將一個偉大人物的完美肖像，於其中造成品格的各種內在的與外界的力之交互作用一一均清晰的表現出來。他的人格之最樸素的輪廓與其生活的外部瑣事以外的任何事物均不得不從略。誠如喀萊爾 (Carlyle) 之設問，『如果忘卻了他那屢遭挫折，永未終止其奮鬥的內在之祕密、

悔恨企圖，『那末，僅祇這些，又有什麼意義呢？關於赫爾巴特內心的長成與發展的顛末之記載均有待於未來。這一簡略的記載，祇不過是一個偉大的生活道旁的一個粗率的路標，如果它能够給在思想世界中旅行的英國人以一種指示，使他能達到他以前幾乎不知的善與美的境界，它的目的即可說是已經完成了。

童年。

約翰·弗里得利契·赫爾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於一七七六年

五月四日生於奧登堡 (Oldenburg) 他父親徒瑪斯·格哈得·赫爾巴特 (Thomas Gerhard

Herbart) 係該城的一個律師及樞密顧問官，似乎是忠實的履行了他的職務，但是對於其職務

上每日刻板生活所需的思想範圍並無擴大之欲望。但是他的母親路易色·學特 (Louise

Shute)，奧登堡城一個醫生的女兒，人則稱之為『一個稀有奇特的婦人。』她完全不似其夫，而

是具有想像力，堅強的意志及相當智慧的人。她異常適合於她的愛之工作，——指導她的獨生子

之早年教育。在執行此工作時，很幸運的，她能將訓練與愛合併起來。赫爾巴特在兒童時曾跌入將

沸之水中，因而影響其健康。因此其母為之在家庭中籌設私人的教導。他對他的第一位塾師——

後日之烏爾尊牧師 (Pastor Uizen) —— 的選擇是極具見識的。他的一切教育設施之目標即是在於培養思想的清晰性，確定性與聯續性，因此而兒童傾向於哲學的秉賦，從此種教育之中得到了一種強有力的刺激。其母親爲着要觀察塾師的影響與教學方法，並且爲着要在任何困難之中佐助其子，所以於其上課時輒親詣教室，並學習希臘文，俾能更充分的觀察其子學習的進度。赫爾巴特其在兒童時期即已表現出領悟並記憶他人思想之特殊能力。他有時會將其在教室所聆聽的教言逐字覆述出來。他對於教學的傾向，頗爲顯著，甚至在其兒童遊戲中，亦明顯的表現出來，其對於自然科學的傾向亦然。他在嚴格的學習之餘並從事於音樂，對於音樂，他具有相當天才。他對於音樂之愛好終其身亦未稍懈。據說他晚年在辛勤的工作之餘，常常在音樂中尋找安慰；其演奏亦甚爲其友人所欣賞。他的關於和聲學的一部著作及一八〇八年所製的一種頗有價值的鋼琴樂曲，——此曲在其百年紀念會中曾經演奏——均能證明音樂對於他，是一種工作，同時也是一種遊戲。無論我們怎樣惑疑他們概括的論點中所包含的真理，我們卻能了解下面一段自傳之寫作是追憶這種兒童時期，兒童時期的心理的秉賦及其順利的環境——「一個受過優良訓練

的兒童的全部觀感，都是趨向於超越於其自身的，當其在八歲的時候，其整個的觀點，即超過了兒童的全部歷史。」（註：此語來自普通教育學之導言。）

他於十三歲入其本城的高等普通學校時，即已經具有『多方面與平均發展的興趣』，這，他後來確定為『教育目標的第一部』。

學校生活。於十一歲時開始學習邏輯，十二歲時學習形而上學，兩年之後，他寫了一篇關於人類的自由的論文。論文的末尾有以下的字句，而在這字句之中於此早年即奇異的指示出爲其一生極其顯著的特性之一的那種理智的正義態度——『如果我們反對一種論證而不能提出反對的理由，則是反乎一切哲學的。』

在他入高等普通學校一年之後，他被編排在初級班，他所愛好的學習爲物理學與哲學。在七七九四年他用拉丁文作過臨別講演，在此講演中他將綏塞路（Cicero）和康德（Kant）的至善觀念與道德哲學的原則相比較，頗爲人們所稱許。至若他在學校中的社會經驗，我們可以想到，他兒童的家庭教育增加了他原來的緘默；他雖然取得了他的同學們的稱許，甚至於同學們的

友愛而與之發生友誼的似乎只有兩個同學，蓬納斯（Bonus）與蘭格路易特（Langreuter）。在冗長的半日假之遠足——因缺乏任何如英國之板球戲那樣的國家遊戲，遠足爲德意志的兒童當時和現在之唯一而普遍的遊戲——的時間中，這三個朋友，常常會沈入於許多問題的熱烈討論中，而有時，如當赫爾巴特以爲他發現了永續運動（perpetual motion）的祕密的時候，他們會迷失了問題的線索和森林的蹊徑的道路，但是他們決不會尋不着他的賢淑的母親，在事先爲之準備好的一籃食品。赫爾巴特在十八歲時離開他的唯一的，高等普通學校，根據卓師的報告，赫爾巴特「在其同學之中是以守秩序，良好的操行，以及無間斷的努力，以發展和改進他的優良的本來能力著稱的。」他具有同時受過標準的古典訓練而同時受過邏輯思想之程序訓練的頭腦；於畢業後立即到耶納（Jena）大學並依其父親的意見學習法理學；此學科對於他完全乏味，他後來終於將此學科棄置了。

。在大學的生活。

耶納大學在當時爲德意志哲學思想的中心。在此地赫爾巴特渡過了三年，如其說他是學習法理學，不如說他專注於哲學之學習。卡爾·萊英侯得（Karl Rheinhold），

爲康德的一個天才門人，他之取吳爾夫（Wolf）的學說體系而代之的具有對於道德基礎之實利主義之學說體系，爲費赫特（Fichte）所繼承。費赫特於一七九四年，即赫爾巴特入校的這一年，在耶納大學擔任哲學教授。最初赫爾巴特從之肄業，後來他曾在某一時期中爲費赫特的熱誠門人。赫爾巴特對於他的教師的天才曾有過至高的估計，並且他亦承認他受費赫特的教益是若何之大。但是這位青年學生的探討精神極爲強烈，不能有所限制，並且他的銳利邏輯，很迅速的即使他確信費赫特的理想主義不是解釋宇宙的適當的學說。後來他寫着：「費赫特教導之有益於我的就是在於其錯誤，其錯誤之所以有益於我，因爲在他的一切探討之中，他的目的是在於確定的思想。如若能具有此目的並能應用此目的，則任何哲學教師均於其學生有益；無此，則後者即將陷於幻想與愚昧之中。」

一七九六年是德意志的哲學分成理想主義與實驗主義兩大潮流的年代。根據赫爾巴特的意見，席林（Schelling）的哲學是理想主義的最邏輯的形式。赫爾巴特在這一年中之對於席林的批評包含着他與費赫特的分歧點，並且我們能很容易的觀察出他自身的未來的主要觀念。他

寫着「無論我們在費赫特的關於自然權利與道德的推論中，能發現多少有意義的思想，我認爲其基本論點——理性動物本身的體會之學說，及自由論均是不正確的。」赫爾巴特在其心智發展之早年的階段，即已放棄理想主義的自由論，因爲此種論點與教育的可能性互相抵觸。卽就這一點而論，吾人即可看到他將來當教師時的一般傾向。在上文所提及的書信之中，他寫着：「我對於人性的自由無過奢的要求。我將人性自由的發揮委之於席林與費赫特，而僅欲以一個人的理智與秉賦的定律來決定一個人，並給以相當的啓發，使之能有所自助。」

這樣，他便與其導師分道揚鑣，開始創造他自己的思想線索，有時他整日整月的將其他的研究均置之於度外，並鬆弛了大學的課業，而專注於哲學問題的探討。各種問題經過他自己如此透澈的思考，而後並與其所揀選的少數友人相聚討論，所以他對於他的材料是有着堅定的把握的；這一種堅定的把握，在其著作與口述雙方都一貫的表示出來。同時在他生活的這一時期中，他還對於荷馬的詩歌加以研究。根據這種研究他提出一種意見而這種意見就是他後來終身所墨守的，並且在他後來擔任教師的時候，他自己且將其實際的價值，給以具體的證明。他認爲這些詩歌

中既然是含着『理想童年之最優良的古典表現』所以在教育開始的時期，便應誦讀這些詩歌。

赫爾巴特的母親爲大學的環境所吸引而此環境於其心身智慧皆極爲適合，所以她樂於離開與其不相融洽的丈夫（後來她終於和他離婚了），而與其兒子在一起。當其子寄宿於耶納大學的時候，她亦寄住於此。在耶納大學中，她與許多教授均有過往，特別是與費赫特、尼塔麥爾（Niethammer）及歷史家吳兒特曠（Woltmann），並且利用她個人與席勒（Schiller）的友誼以形成其子與此詩人之間的友誼，這種友誼的痕跡時常在赫爾巴特的著作中流露出來。在此時她又給予了他兒子的前途一種有益的影響。她將他對於教育一向潛伏着的深刻興趣導入教育的第一步實際活動之中，從此，這種興趣便逐漸顯示出他一生所愛好的工作。按照他母親的建議與忠告，他遂於一七九七年初期在他修完課程之前即離開了大學，而開始擔任斯台格爾瑞吉（Steiger-Reggisberg）先生——茵特拉鏗（Interlaken）城的監督——之三個兒子的家庭教師。到後來母子之間一向保存的歡愉關係約略的黯淡一些。她認爲在哲學的研究（他後來又回復到哲學的研究）之中對生活的實際要求，不能得到充分的供給，所以她對於赫爾巴特後

來的各種計劃皆不如以前那樣的贊助和同情。至於在他這方面，則似乎一直未保留着他對母親的愛的天性。我們在他於一七九九年，當其母親犯病的時候，連同其他的各種條件，使他辭去他的家庭教師的職位時，給予其友人斯米特（Schmidt）的信中，亦可看見他那充滿着愛的天性的痕跡。『設若不是我要順從我的犯着疾病的母親之意旨而離開職務，我想我定能將我的花園（他的學生）以不可侵越的籬籬圍繞起來。我曾請求她不要故意將她的意見隱蔽起來，現在你可為我希望的補賞就是在減輕她的苦痛之期冀的安慰之中。我的賢良的、我的永久的賜福的人！如果在任何可能的範圍之中我能報答她，我是多麼樂意於報答她呵！』

家庭教師的生活。

『一個人所有的道德與智慧，——所有的忍耐、堅持、精神、忠誠、方法、機敏、力量——總而言之，一個人所有的精力，均在其所作的工作之中，很清晰的刻劃出來。欲去尋找一種比較赫爾巴特的工作中所包含的心與智的記錄更為優良的實屬困難。如他所說，他之進到他的「充滿着希望、期盼、責任與計劃之新的世界中來，是抱着一種極為誠摯的目的，不然他就不配得到這世界所獻予他的幸福。」我們從其給予他友人瑞斯特（Riist）的書信的字句中可以

知曉他的學生的狀況，以及其他的一般環境。『所給予我耕作的一塊田地，大自然並未忽略，雖然這塊田地停荒了過長的期間，土壤均變成堅硬，在播種任何種籽之前，必須徹底的疏掘過……友誼的面孔，需要幫助時的助手，體諒與禮貌，以及最重要的在工作佈置中之絕對自由，連同那對於結果之最大的興趣——我所需要的一切在斯台格爾東家家中均具備着……男子有丈夫的威儀，女有賢淑的婦道，兒童有活潑天真的品質；他們的外表與內心完全是一致的，即使不是完全美的，但至少卻能滿足真理的條件……斯台格爾本人極誠懇而嚴正，而且並不拘泥；他幾乎無所偏執，只要有理可言他即能接受一切。有時他極為歡欣愉快；在他治理之下，全家都生活於井然的條理之中，其妻則一貫嫺雅、良善及仁慈，其兒童亦極為歡欣活潑。此家雖非天才會萃之所，而卻飽有康健的常識。』

斯台格爾先生大概觀察出其家庭教師之罕有的才能，所以將其三子魯得維希（Ludwig）、卡爾（Karl）及陸杜夫（Rudolf），——其年齡循序為十四歲、十歲及八歲——之教育完全委之於他，唯一的條件為赫爾巴特每隔兩月應將其工作的計劃及學生的進度作一書面報告。此二

十四封報告書中只保存了五封，但這五封報告書中卻包含着嚴格根據於心理學，慎重計劃過的一種教育之特殊程序的綱要，並以一种罕有的教育鑑別力以求其適合於這三個兒童的個性及其年齡。在此地我們所涉及的爲赫爾巴特之爲人，並非其爲教師，所以吾人只附帶提及這些報告書雖是他在二十一歲時所寫的，但是卻包含着 he 後來的學說體系的結構之基本觀念。在這裏他首先提起一種有教育價值的教學之觀念並首次言及八歲至十歲的兒童誦讀奧第塞（Odyssey）原文的可能性及閱讀之利益。在這裏我們看見他努力激勵他的學生，使之有多方面的興趣，並且他努力以與學生共同研究同一材料的方法，將學生的興趣與教師自己的興趣交織在一起。總之，在此地他獲得了豐富的教育經驗，這種經驗使他能够在十二年以後當他將其價值在實際上與理論上試驗過之後，寫出下列的言論：『即使是兩個或三個學童的塾師，吾人亦能創造其自己的學校。凡是能在教育之中感覺藝術興趣的人，對於他的那一種狹小而黯淡的地位，最初或者會感覺着拘束限制，但很快卻會使之變成若是之光明，若是之廣大，即能在其中體驗出教育的全部，以及其一切的動機與需要，而這些動機與需要之滿足確實是一種極其廣泛不可限量的工作。